

国外中国学研究

第 一 辑

张良春 主编



漓江出版社

国外中国学研究

第 一 辑

张良春主 编

漓江出版社

国外中国学研究

张良春 主编

✱

漓江出版社 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 号

邮政编码:541002

四川外语学院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438 字数 254千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7-5407-0596-6/I·443

定价: 9.80元

前 言

季羨林

说老实话，当我最初听到四川外语学院成立了一个国外中国学研究所的时候，我颇为感到吃惊：怎么还会有这样的组织呢？但是，继而仔细一想，我“顿悟”了：这样的组织不正是过去完全没有人想到过而我们今天却是非 常 需要的吗？

这要从远处讲起。中国学在国际上不是一门新兴学科。大概从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主义者，用各种方式，通过多种途径，派人到中国来的时候起，中国学就算是开始存在了。根据我的理解，中国学是一门综合的学科。这些西方人到了中国以后所写的一切东西，不管是哪一行哪一业，都属于中国学的范围。西方这一批人主观动机不同，其中也确实有一些抱着侵略目的而来的，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必然是戴着有色眼镜的。特别是那一批天主教和耶稣教的传教士，他们多半认为中国是文化不高的民族，甚至是野蛮民族，必须把他们的上帝请了来，传布“福音”，中国才能得救。可是其中也确实有一些人，抱着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态度，来研究中国文化、中国问题。我们千万不要良莠不分，放在一个锅里煮。

即使是对那些动机不纯的外国研究中国的学者，我们也

要有一点辩证的观点。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外国的传教士们喜欢到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去，比如云南、四川、西藏等地区、都是他们热衷于钻进去的地方。他们的用心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然而他们传教以外的一些工作，比如制订新文字、研究当地的民俗等等，难道一点积极的作用都没有吗？马克思当年论到英国在印度的统治的时候曾经指出，英国在印度的一切措施，比如修铁路等等，其目的无非是想尽快尽多地剥削印度人民。然而其结果却是事与愿违，这些措施带给印度人民科技知识，提高了他们的科技水平和觉悟。这当然决不是英国殖民统治者所乐意看到的事情。即使外国人怀着偏见谈论我们的缺点，我们也要有点辩证观点。鲁迅先生在《华盖集续集·马上支日记》中写道：“我自己想，我对于外国人的指摘本国的缺失，是不很发生反感的。”类似的话，他在别的地方也曾说过。我想，鲁迅的用意无非是想借外国人指摘这一面镜子，照一照我们自己，指摘对的就接受，不对的就拒绝，用不着一听指摘就火冒三丈。

我在上面讲的主要是过去的中国学。那时候，中国要么是封建帝国，要么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亚病夫，外国人到中国来，对我们有点蔑视，是不愉快的，但是可以理解的。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外国人再也不敢小看我们了。所谓中国学和中国学家，据我个人的观察，已经走上了一条同过去有点不同的道路，呈现出过去不可能有的崭新的面貌。他们多半是怀着善良的愿望，从事中国学的研究的。不管是研究宗教学、还是研究文学艺术，或是研究语言文字，有的人成绩斐然可观，受到国内学者的赞扬，同国内同行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我决不敢说，外国的中国学家对中国文化都理解得完全正确，他们的研究工作没有主观隔膜的情况，没有在意无意中歪曲的地方。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不管怎样，他们理解对了的，可以供我们参考。由于民族传统文化不同，他们观察问题的角度有时同我们不同；但是，正因为如此，他们往往能看到我们忽略的东西。即使他们看错了，我们也可以从中吸取一些教训。无论如何，中国两句俗语完全可以用在这里：“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但是，外国的中国学家的作用，还不只限于此。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外国人民对中国友好渴望了解中国的也越来越多。没有一个媒介，没有一座桥梁，外国人民是难以了解中国的，外国的中国学家就正是这样的媒介，这样的桥梁。他们的工作能促进外国人民同中国人民的友谊，他们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之间架起了一座友谊的金桥。

然而，在过去，我们对外国中国学家的工作太不注意了。有一些人根本不知道什么中国学，有一些学者也漠然置之。这既不利于中外人民友谊的增强，也不利于中国人民对外国的了解。这种情况也不能让它再继续下去了。

现在四川外国语学院建立了国外中国学研究所，创办了《国外中国学研究》，真不能不说是目光远大，应该受到我们的最高的赞美。我个人愿意充当一个马前小卒，为各位先知先觉摇旗呐喊，共同推进这一项非常有意义的事业。

是为前言。

国外中国学研究

张良春 主编

漓江出版社出版

目 录

前言.....季羨林 (1)

国外中国学概况

外国中国学的兴起, 发展

及我国研究外国中国学的前景.....朱雪宝 (1)

国外蒙元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沈卫荣 (20)

欧美各国满学研究概况.....刘均仁 (59)

东欧国家及苏联的东方学与中国学研究

.....杨洪鉴编译 (74)

德国“中国学”的创立及其发展.....汪 沂 (89)

法国汉学界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过去

与现在..... [法] 雷威安撰 陈 喆译 (103)

波兰的中国学..... [波] 金思德撰、徐荣枢译 (118)

日本的辛亥革命研究.....王荣梅编译 (123)

现代日本与中国研究

..... [日] 多田狷介撰、赵戈非译 (133)

中外文化交流

卫礼贤与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杨武能 (148)

对“道”的追求

——老庄思想与德国文学家……………李昌珂 (176)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国外学者论抗战前的中国现代

文艺思潮……………张良春 (190)

日本学者评张贤亮的作品……………王 敏 (203)

中外比较文学

《儒林外史》与《死魂灵》……………刘登东 (208)

古代东西方寓言之双壁

——《庄子》寓言与《伊索寓言》……………张鹏云 (238)

海外华人社会

美国华人……………阮西湖 (259)

中国边疆民族研究

国外关于敦煌藏文文献《阿柴纪年》的研究

……………周伟洲、杨明 (265)

国外学者对彝族族源的考证……………张良春 (280)

法国学者对贵州史的研究……………杨佑方 (303)

贵州史研究导论

……………[法] 隆巴尔·萨尔蒙 撰 耿昇 译 (310)

新书评介

埃伯哈特《中国史》评述……………杨 铭 (339)

《道教史研究》介绍与评述

…………… [日] 窪德忠 撰 杨洪鉴 译 (345)

外国中国学的兴起、发展 及我国研究外国中国学的前景

朱雪宝

我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又是一个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国的未来，在外国人心目中，将是一个“明天的强国”。因此，研究中国，已成为外国中国学家富有理想的广阔天地。

几个世纪以来，外国一直在对中国进行研究，特别是当代，外国研究中国，已进入一个利用电子计算机和计量研究的历史新时期，研究范围不仅只限于中国的文化、历史、语言、文学，而且已广泛涉及到我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各个领域，特别是研究我国当前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已成了许多外国中国学家研究中国的热门课题。

中国学亦称汉学，鉴于外国研究中国不单纯研究汉族，还研究其他民族，所以，我们把外国人研究中国总称为中国学。关于外国中国学的兴起，中外均有文字记载，由于中国进入封建地主经济为基础的君主专制官僚社会要比欧洲早一千七百多年，在这段历史长河中，中国一直是一个吸引西方

世界的先进大国。我国丝帛在汉朝远销希腊，佛教和文化在唐代东传日本，使西方世界心向神往。13世纪马可波罗《东方见闻录》问世，向西方世界展示了中国元朝社会的兴旺发达。1585年西班牙传教士门多萨的名著《中华大帝国史》在罗马发表，这部对中国进行全面介绍，并又把中国描写到完美无缺，赛似天堂的著作，后又被译成多种文字后，轰动了整个欧洲，中国在西方成了人们理想的大帝国。到清康熙年间，法国耶苏会教士为了颂扬康熙皇帝，他们用最美的赞词把清帝国描绘得尽善尽美，使欧洲那些对本国腐败的王权统治极为不满的民主知识分子寄希望于中国，他们以天国的形象赞颂中国，引起了西方世界的“中国谜”，于是，西方国家就不断派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一方面在中国传教，另一方面又对中国进行系统而又确切的了解，这些传教士，后来就成了西方汉学的先驱。笔者列举下面几名传教士加以说明。

1581年，耶苏会派意大利籍传教士罗明坚(1543—1607)、利玛窦(1552—1610)等人常驻澳门，并让他们专学中文。此际利玛窦努力钻研汉语、汉字和我国经典文化，频繁接触中国文人和士大夫阶层。1601年，利玛窦在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陪同下来到北京，受到明万历皇帝的厚待，并在北京定居十年，他在向中国介绍西方天文、数学和科技知识过程中，结交了徐光启、李元藻、廷筠、李贽等名士，并与徐光启等人合作、译述了《几何原本》、《同文算指》、《测量法义》、《万国舆图》等名著，又把中国的儒家经典译成拉丁文，编写了《中意葡字典》和《中国文法》手抄本，传供欧洲人学习汉语。后来法国耶苏会教士金尼阁(1577—1628)

继承了利玛窦的事业，他在中国进行传教的同时，从事中国历史、语言方面的研究，致力于东西方文化交流。金尼阁根据利玛窦遗留下来的意大利文手稿，加以整理并转译为拉丁文，后又做些增补，编成了《基督教远征中国记》，于1615年在奥格斯堡出版，这是欧洲人记叙中国状况第一部比较完备的专著，而且在西方汉学史上也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1688年，法国耶稣会教士洪若翰（1643—1710）、张诚（1655—1707）、李明（1655—1728）、白晋（1656—1703）和刘应（1656—1737）等五人组成被称为“法国派往中国的第一个科学代表团”来到北京开展传教活动，并从事搜集和研究中国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的情报，通过他们做媒介，法国掀起了“汉学热”，并出版了许多有关中国的历史著述和文学作品，对西方知识分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人甚至认为这些著述和作品，陶冶了18世纪部分人们的思想，从而使欧洲学术界掀起了第一次“中国热”浪潮。法国18世纪最大的汉学家宋君荣（1689—1759）在北京居住了37年之久，他于1721年起程来中国，1723年4月到达北京，由于他谙汉语和满文，所以他长期在北京担任清廷与俄国交涉的翻译官，宋君荣还精通自然科学、语言学和历史学，并对中国历史和天文学素有研究，他的名著有《成吉思汗和蒙古史》，编纂了《中国纪年方法》，他把《书经》、《礼记》等中国经典著作译成了法文。宋君荣是法国科学院通讯院士、圣彼得堡科学院名誉院士和伦敦皇家学会院士。继法国来华传教士后，英国第一个来华传教士是马礼逊（1782—1834），他第一次把《圣经》译成了中文，还编写了著名的《英华字典》。美国第一个来华传教士是裨治文（1801—1861），他

于1830年到达广州，1832年创办《澳门月刊》，自任总编，《澳门月刊》以报导中国历史、风俗、时事和传教士活动为宗旨，是美国最老的中国学杂志。

19世纪西方各国为发展汉学，他们在最高学府纷纷举办汉学讲座。1814年法兰西学院首次开办汉学讲座，并在西方高等学府中又第一次把汉学列为正式学科，从此，法国的汉学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对推动欧美其他国家的汉学研究发挥了重大作用。在它的影响下，俄国和德国也先后在科学院设立了汉学研究机构。到19世纪后期，英美几所名牌大学也陆续举办汉学讲座，承担这些汉学讲座的教授，最初几乎全是早先来华的基督教士。

20世纪后，外国中国学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西方汉学家们逐步摆脱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等教会势力的束缚，开创了以欧美几百所大学和各种学术研究机构为主体，深入、广泛研究中国，蓬蓬勃勃开展学术活动的新局面，到20世纪60年代末，全世界已有12个国家备有充足设施对中国进行有计划的研究。这些国家是：美国、苏联、日本、联邦德国、英国、法国、荷兰、丹麦、瑞典、澳大利亚、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此外，还有香港地区和19个国家。他们的条件虽比不上这12个国家，但对研究中国也具备了一定条件，如在高等教研系统也设置了研究机构，并配备一定设施和力量，对中国进行一定限度的研究。这19个国家是奥地利、比利时、匈牙利、印度、以色列、意大利、马来西亚、挪威、菲律宾、波兰、新加坡、民主德国、智利、芬兰、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南朝鲜、泰国、新西兰。现在，全世界已有几十个国家，几百个机构、成千上万的学者在研

究中国。特别是美国、苏联、日本和欧洲几个国家，他们不仅有系统的研究机构、广泛的联系网络和先进的设备，而且他们资金雄厚、人员充足、分工细致、任务明确，受到本国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而且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成果，成了各国决策机关的重要依据。下面分别介绍几个名列前茅的国家中国学研究状况。

在美国，据了解有些学术团体要求“将中国学研究作为全国性事业。”如果查一下美国中国学历史，美国并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资本。从时间上见，它对中国的研究远比欧洲和日本要短，但由于美国政府和各大基金会对中国学研究的重视及给予大量投资，使美国中国学得以迅速发展和领先世界。

从19世纪前半叶开始，随着美国商业资本向中国大量渗透和成批商船队来中国，美国的传教士也接踵而来。如1803年美国传教士跟美国首批来华商船在广州登陆，1874年卫理公会的传教士也在福州登陆，得19世纪末，由于美国海外教会在向外扩张中又大量增派传教士来华，致使当时在华的美国传教士达1500人之多。这样，美国中国学就在美国资本主义进行掠夺性贸易，特别是在对中国进行侵略和扩张中逐渐掀起。从19世纪70年代起，美国开始在大学里设立关于东方和中国的教研机构。1876年在卫三畏主持下耶鲁大学设立了第一个汉语教研室和东方图书馆，接着加利福尼亚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也相继成立了中国学教研机构和图书馆，而这些机构和图书馆也就成了美国中国学形成的一个标志。这时期美国中国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广泛吸收外国人特别是欧洲人来从事中国研究，所以这时期的美国中国学，不

论其研究领域或研究方法，都受到西欧旧汉学传统的严重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已有90个中国学研究机构，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50年代，美国中国学如与欧洲相比则是一个发展较快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美国从组织和经费上加强了对中国的研究，即使在困难的战争年代，政府还专门设立了培训中国问题专家和研究中国的指导机构，并把战前从事东方学教研工作的7所第一流大学到战时增至为13所，到50年代又增到30多所。此外，美国在战争年代采取了多种紧急措施来加速培养研究远东和中国问题的专业人员，并大力加强对中国现实研究的力量，因此，到本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中国学进入了一个迅猛发展时期。据著名中国学家费维凯1979年4月估计，在美国各大学任教与从事研究的中国学博士约有1000人之多。另外又据欧洲研究中国协会首任秘书长施博尔教授估计，在这时期的美国整个中国学家队伍人数（不包括研究生）约有3000人。关于中国学研究的经费，在50年代末，美国政府和基金会就开始向研究机构大量拨资，仅从1958至1970的十二年中，美国政府的拨款总额就达1504万美元；各大基金会的拨款总额达2593.3万美元；各大学自身对中国研究的拨款总额也达2000万美元。此外，美国福特基金会和洛克非勒基金会在这12年期间对国外（即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日本等）的中国研究拨款达316.6万美元。如果加上其他来源，这一二年美国对中国研究的各种公私拨款已超过7000万美元，其中福特基金会出资最多。当然，美国政府和基金会对中国研究的大量投资是与他们的本身利益和中国学所处的时代特点分不开的，1973年11月，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和社会学理事会在纽约召开关于“优先

考虑中国研究的规划会议”。与会者一致同意今后十年一定要继续采取以发展当代中国研究为主的方针。因此，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中国学家的访华人数日益增加，而且从1978年以来的美国社会科学访华代表团的成员成份看，大多数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所以，不难预计，今后美国对中国的研究必然会有更大的发展。

在美国发展中国学方面，也有必要提一下美国情报机关对中国研究的重视和资助。1951年，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成立国际研究中心时，除接受福特基金会资助外，也接受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资助。1963年，接受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的亚洲基金会协会和美国耶鲁大学雅礼协会、哈佛燕京社联合起来在香港成立了香港中文大学。同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图书馆馆长斯万克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东亚图书馆馆长吴文律的撮合下，又把香港崇基学院、新亚学院、联合书院的三所图书馆合并为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而且用于专门从事搜集、整理、分析和研究有关中国的资料，为美国进行中国研究提供资料和情报服务。1973年2月，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司召开“关于中国今后发展趋势”的分析会议，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中国问题专家均参加了这次会议。1975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在中央情报局的资助下编辑出版了七种有关中国问题研究丛书的缩微复制品。由此可见，美国情报机关也非常重视美国中国学研究。此外，美国政府官员对美国中国学家的第一手研究材料也极为重视。如美国国会研究处负责亚洲问题的首席官员罗伯特·萨特，在他定稿一篇报告时，还要向中国问题专家征求意见。他说：“当我刚写完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报告时，即使在写报告期间，我